

思想周刊 / 学习

溯理论之源 明法治之道 树立法治信仰 形成法治风尚

■ 马怀德

道路决定命运,思想引领征程。二十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以非凡的战略远见,在之江大地亲自擘画并部署了“法治浙江”建设。这一重大决策,不仅是省域治理现代化的先行探索,更让浙江成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萌发地 and 实践源泉,为我们今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滋养,开展了有益的实践探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第一,深刻把握坚持党的领导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前提。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对法治建设政治方向的思考与实践,为“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奠定了坚实基础。他深刻指出,推进法治建设,最根本的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起来,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那种假借民主、假借法治来否定党的领导错误倾向,强调“建设‘法治浙江’绝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更好地、更有效地坚持党的领导”,并亲自担任“法治浙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将党的领导贯穿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这一时期的浙江实践,清晰地体现了党在法治建设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本质特征”的先行探索。这启示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这是确保法治中国建设行稳致远的根本政治保证。

第二,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法治领域的要求。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将“法治浙江”建设纳入全省“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实质上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核心要义在省域层面的率先展开与生动体现。浙江的探索雄辩地证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要在法治轨道上坚持和巩固根本制度,并通过法治方式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决不照搬照抄外国法治模式。

第三,深刻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

法治价值追求。法治为了谁、依靠谁,决定了一条法治道路的根本属性。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深刻指出,人们没有法治精神,社会没有法治风尚,法治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根之花、无源之水,要使法律风尚“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部署“法治浙江”建设时,他将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作为核心任务,推动基层民主法治创新,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这些理念与实践,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在省域的早期阐发与深入践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人民性这一特质的鲜活源头。浙江二十年的实践表明,法治建设必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就是要始终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使法治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信仰和自觉行动。

第四,深刻理解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良法善治逻辑。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法治与德治的协同,部署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引领价值观念,注重挖掘浙江历史文化中“义利双行”等法治与德治基因。这些思考和部署,是对“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一鲜明特点的先行探索与重要奠基,展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德法共治的东方智慧。浙江的经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一条注重规范与教化并举的善治之路。坚持这条道路,就要持续推动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实现“法安天下”与“德润人心”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法治建设的重大理念和丰富实践,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源头活水,深刻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价值追求和鲜明特色。二十年来法治浙江建设,为我们理解这条道路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合理性及显著优越性,提供了一部最生动、最鲜活的教科书。中国人民大学将携手浙江,深挖思想“富矿”,加强学理阐释,推动实践升华,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

■ 李林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核心在于提升公民法治素养,使法治成为思维与行为习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法治精神是法治的灵魂”重要论断及“使法必行之法就是法治精神”等标识性概念,为法治建设提供了核心指引。二十年来,浙江坚定推进“法治浙江”建设,通过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与形成法治风尚,在全民守法领域实现了理论、制度与实践的多重突破,为全国推进全民守法贡献了宝贵的省域样本。

弘扬法治精神,把握全民守法着力点。全民守法的最高境界,是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法治信仰普遍确立。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人们没有法治精神、社会没有法治风尚,法治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根之花、无源之水。”这阐明了法治精神的本质特征,明确了法治精神、法治风尚在法治建设中的本源地位。他还指出:“突出培养公民的法治精神,在全社会树立法治信仰、形成法治风尚,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熔铸到人们的头脑之中,体现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只有通过久久为功的教化熏陶,使社会公众亲身感受法治、主动学习法治、内心信仰法治、自觉恪守法治,才能真正培养起人们的法治精神。二十年来,浙江始终把弘扬法治精神作为推进全民守法的重要抓手,努力在全社会树立法治信仰、形成法治风尚,谱写了全民普法守法在省域层面创新发展的生动篇章。

培育法治文化,厚植全民守法根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而这种信仰根植于先进的法治文化之中。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文化对法治建设的重要作用,鲜明指出:“无论是法制的健全,还是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等制度的完善,都需要先进的法治文化作支撑”,提出弘扬法治文化的“四个重在”,即重在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在培养公民的法治精神、重在提高全社会的法治化水平、重在在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他还高度重视重视从浙江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法治资源,特别关注浙江“和合”文化关于“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二十年来,浙江将“和合”文化、胡公文化、陈亮文化以及

儒家文化中蕴含的契约精神、规矩意识、诚信守法、忠孝仁义等文化精髓,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融合,赋予全民守法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完善体制机制,增强普法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普法工作要紧跟时代,在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功夫。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明确要求构建全方位的法制教育体系,建立完善普法教育工作的长效机制,增强普法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他的推动下,浙江省委建立了“党委统一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各部门配合、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普法”工作格局,主动“把法制宣传教育纳入各级政府、行业主管部门、企事业单位及其主要领导干部的工作目标”,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全民参与的普法合力。他还强调,在着力点上,要突出培养公民的法治精神,在全社会树立法治信仰,形成法治风尚;在内容上,要深入开展以“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为主要内容的公民法制宣传教育;在手段上,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全社会共同参与;在对象上,要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的法制宣传教育。二十年来,浙江建立健全法治教育体制机制,从有利于公民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制观念、提高依法维权能力出发,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主动性,在全社会营造了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正义的良好环境。

回望“法治浙江”建设20年的非凡历程,我们清晰看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全民普法守法的一系列深邃思考与探索实践,不仅是破解当时“成长烦恼”的治理良方,更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全民守法理念形成发展的源头活水。站在20年的新起点,浙江应进一步升华“法治浙江”的理论范式,从学理深度与实践广度,持续挖掘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浙江的萌发逻辑,统筹法律的刚性约束与文化的柔性滋养,探索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法治社会运行机制,推动守法从他律走向自律,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更高质量的法学实证案例,让法治文明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我在之江学新语
学思想 改文风 求真知

优化提升传统产业

唯有练好“内功”,才能凤凰涅槃

■ 戴翀

《结构调整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根本》一文指出,要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兰溪作为浙江老牌工业基地,走什么路才能跟得上发展步伐?我们深信,唯有练好“内功”,才能凤凰涅槃。

练好内功,始于搏击蓝海的勇气。传统产业转型,最难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直面“船大难掉头”的阵痛。我们坚持“政府主导+专家诊断+企业实践”,创新“4+X”智改数转模式,用“看得见”的成效作引领。在万舟集团,设备全打通、数据全提取,如今全国每十米棉坯布就有一米“万舟造”;在鑫兰纺织,“未来工厂”拔地而起,人工智能投入产线,去年企业成功入选工信部5G工厂名录。

练好内功,成于步步为营的稳健。转型不是“翻烧饼”,突围不是“赌一把”。精彩蝶变的背后,往往是企业的稳扎稳打、政府的不离不弃。“华东铝业”的接盘企业用两年时间“选题”,最终锁定光学膜赛道。从上一条中试线,到获评省级专精特新产业园,每一

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

■ 蔡继明

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石,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基本盘”。《之江新语》指出,“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使传统产业在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下提质增效、实现蜕变,才能使现代化产业体系“根深叶茂”。

技术创新是传统产业焕新的“金钥匙”。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没有一家企业能置身事外,没有一款产品能永立不败之地。传统产业必须主动应变应求变,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淘汰落后产能、转变发展方式,大力开展符合时代发展方向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产业创新。企业要有危机意识,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瞄准关键领域核心环节加大研发投入,持续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

协调布局是产业体系谋新的“方法论”。新旧质态生产力的平稳过渡,既关乎产业体系现代化的转换节奏,又关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接续成败。必须统筹传统优势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

传统产业不是包袱,而是宝贵家底

■ 黄友洪

《宜轻则轻,宜重则重》一文提出,我们要抓住科技创新和实施品牌战略两个重点,全面提升产业层次,提高企业素质,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增强区域特色经济的竞争优势。“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理念始终是指引鑫兰前行的灯塔,也让我深刻体悟到:传统产业唯有守正创新,方能行稳致远。

2003年,我在兰溪三鑫路创办鑫兰纺织,彼时纺织产业竞争激烈,低端同质化的竞争比比皆是,企业发展必须离开这摊逆水。为此,我们锚定科技创新这一内在驱动力,提出三大发展理念,为远航校准航向:聚焦织造主业,深耕一块布的研发与升级;秉持解放思想,主动探索新模式、新方法;坚持科技兴企,大力培育专业化人才队伍。

当下数字经济浪潮奔涌,我们紧跟时代步伐,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以打造行业示范“头雁工厂”为目标,持续优化数据智能制造体系,通过将智能验布、AGV搬运、智能立体库等自动化设备与数字化平台深度融合,实现小批量、多品种的柔性化、数智化生产,致力

(作者为浙江省“八八战略”研究院、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智库联盟、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浙江财经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



浙江实践为“大思政课”注入源头活水

■ 刘向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将浙江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的生动实践,系统转化为“大思政课”的源头活水,是引导青年洞察时代、投身伟业的重要路径。它要求教育者引导学生,从“八八战略”的演进中把握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从破解发展难题的历程中领悟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从地方经验升华为国家战略的跨越中理解中国道路的普遍意义。

省域治理的“成功密码”与理论萌发的“实践先声”

“大思政课”的生命力在于理论联系实际深度与信度。浙江实践之所以能成为不可多得的教学富矿,源于其内在的三个核心逻辑基点,它们共同构成了理解党的创新理论在地方生动实践的坚实三角支架。

第一,战略擘画的系统性与前瞻性,提供了理解顶层设计逻辑的范本。“八八战略”是浙江全部工作的总纲领,其深刻性在于它绝非应对一时一地问题的战术集合,而是一次基于对省情深刻洞察、对规律精准把握的系统性、前瞻性战略布局。在“大思政课”中全面梳理“八八战略”从系统提出、到丰富发展,再到深化升化的全过程,本质上是向学生展示国家与省域层面如何运用战略思维进行系统性、前瞻性治理的鲜活过程,使学生了解到宏大国家叙事背后的严谨逻辑与科学规划。

第二,理念萌发与验证的在地性,构成了理论溯源溯流的生动现场。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这意味着诸多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重大理念,最早是在浙江的土壤中破土、萌芽并得到初步验证的。讲授这一从“浙江萌发”到

“全国实践”的源流关系,能使抽象的理论具象化为可感知的地方故事和历史场景,极大地增强理论的亲和力与说服力,让学生理解党的创新理论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发展的科学体系。

第三,实践成果的示范性与可诠释性,支撑了从地方经验到普遍话语的跃升。浙江的发展成就,不仅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更因其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具备了被深度理论诠释的丰富内涵。例如,浙江在“千万工程”引领下实现的乡村深刻蝶变,就可以被系统阐释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共同富裕的经典案例;数字政府建设所体现的治理效能革命,则可升华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中国方案。这些实践成果为“大思政课”提供了坚实而鲜活的“事实基底”,使教师能够引导学生从具体的、成功的浙江现象出发,运用理论工具进行剖析,自然而然地抵达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理性认知,完成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同的飞跃。

贯穿于实践深处的科学思维与系统方法

浙江实践之所以超越普通的地方经验,成为“大思政课”的方法论宝库,关键在于其发展进程中一以贯之并得到卓越运用的科学思维与工作方法。这些内嵌于实践肌理之中的方法论精髓,是将浙江故事升华为教学案例,将发展智慧转化为育人资源的桥梁,为学生提供了观察中国之治、分析时代之问的“思想钥匙”。

其一,是系统思维与整体治理的典范。“八八战略”本身就是一个高度系统化的有机整体。“千万工程”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一项历时二十余年、一以贯之的复杂系统工程。它从整治农村环境“脏乱差”的“小切口”

入手,逐步拓展到乡村产业、文化、治理、生活的全方位“大变革”,展现了“规划一张图、建设一盘棋、成效一体化”的系统治理智慧。剖析这一历程,能让学生深刻理解,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问题,必须善于运用系统思维,进行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和整体性推进。

其二,是问题导向与底线思维的实践。浙江的发展始终在破解“成长的烦恼”中前行。面对“先天的资源约束”与“后发的环境压力”,浙江没有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较早确立了“生态省”建设目标,这体现了对发展底线的前置性守护。从在全国率先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到推行严格的环保准入标准,再到发展生态经济,这一系列举措生动诠释了“该为的必须为”(保护生态)与“不该为的决不为”(牺牲环境)的辩证统一,是培养学生树立正确发展观、政绩观的绝佳案例。

其三,是扎根群众与务实创新的统一。浙江的活力源于市场、源于基层、源于群众。“枫桥经验”从基层治理的实践创造,历经时代淬炼,升华为“党建统领、人民主体、三治融合、四防并举、共建共享”的现代治理范式,其灵魂正是“依靠群众、源头预防”。同时,浙江干部与企业家群体中深厚的“务实”基因,使得各项政策创新与商业探索都能紧密贴合实际需求,不尚空谈。这为阐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供了最为鲜活的当代注脚。

从“地方性知识”到“普遍性叙事”的范式贡献

将浙江实践融入“大思政课”的最高价值,在于其成功实现从“地方性知识”向“普遍性叙事”的创造性转化与升华。这不仅在教学案例的简单引用,更是通过浙江这一“重要窗口”,向学生生动展示中国道路的实践逻辑、中国方案的可行性与中国价值的普适